

文史精華

撷珍本·下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文史精华》撷珍本(上下册)

《文史精华》编辑部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 20 号)

石家庄方正计算机公司排版

内蒙古新华书店经销 石家庄市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36 字数:1000 千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204—03747—2/K·284 上下册定价:42.00 元

目 录

●回首往事

我的童年/侯宝林	3
周恩来派我见囚禁中的叶挺/陆 治	8
与白求恩大夫在一起的日子里/何自新	11
我驾机起义前后/梁惠福	14
回忆“穷棒子社”/王国藩	19
韩复榘审案实录/乔新尘	29
记蒋介石的一次召见/韩立才	30
何键派人挖掘毛泽东祖坟经过/阳涛良	31
李公朴、闻一多被害案惩治真相/刘荷光	33
川岛芳子对艺人的迫害/李万春	35
川岛芳子伏法目击记/迪 中	37
追忆侦破炮轰天安门案件/李宝树	40
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目睹记/张钟秀	43
“文革”期间的李立三/李思慎	46

●人物春秋

陈毅谪居石家庄/张建华	49
毛泽东与续范亭/杨子 谢江	54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吴禄贞/郑一民 陈跃林	56
冯治安将军事略/张闻达	65
民族英雄马本斋事略/献 文	72
胡适与溥仪/杜春和	75
我所知道的商震将军/王兴纲	78
朱占魁沉浮录/李 锦	85
回忆载涛先生/郑新潮	92
李莲英轶事/崔跃魁	97
军阀孙殿英生平见闻录/李鸿庆 程一民	103
李立三之死/习 金	123
近代中国“四公子”/任凤霞 迟秀才	125

●政坛纵横

台湾“孙立人兵变”案内幕/李伶伶 王一心	128
汪精卫河内遇刺始末/赖敬业	137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自治政府/陈仲庸	144

●军史兵林

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莘园	147
傅作义困守涿州百日记/王畅 桂郁	157
马革裹尸——戴安澜将军殉国记/李 颖	167

目 录

EA36/44

●史海存真

西柏坡土改风云录/阎 涛	169
军统特务破译密码内幕/陈 达	176
“名将之花”日中将阿部规秀毙命黄土岭/省志办	179
绝域逢生的美军飞行员/史向荣	182
袁世凯葬母/李相宾	188
1947年“共党谋报案”/李敬尧 朱 赤	191
陈仪其人与台湾“二·二八”起义/汪天民	199
汪精卫墓被炸始末/王怀廉	202
张作霖祖籍探源/李玉川	203
末代皇妃离婚记/张景宝	205
张之江南京烧鸦片/郭瑞祥	209
回忆王若飞在绥远被捕前后的经过/王任之	210

●百年要案

共和国反腐败第一大案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始末/石玉新 孙如宾 武永召	211
南京刺汪案的最后判决/刘澄清	225

●经济史踪

李嘉诚事业发展的三次机缘/方式光	227
曹锟盗印东三省银行假钞之真相/孙树勳	231
武百祥的经商之道/杜士林	233
大漠商舟/于文龙	237

●文化天地

张伯苓与中国话剧第一出/张玉芳	241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晏升东 孙怒潮	242
胡适之先生逸事一束/魏际昌	247
关东的烟文化/曹保明	253
体坛宿将穆成宽/王文生	255
旧北京的集邮活动/杨启明 沙伯泉 韦景贤 王席儒	263
评剧之父成兆才/时 光	267
一代名伶刘喜奎轶事/陶广仁	270
回忆我的父亲奚啸伯/奚延宏	273

●旧闻杂俎

奶奶庙与尼姑泪/马淑敏	278
旧北京的“三阀”/陶广仁	281
“八大胡同”妓院黑幕/阿 尚	284

目 录

●回首往事

我的童年/侯宝林	3
周恩来派我见囚禁中的叶挺/陆 治	8
与白求恩大夫在一起的日子里/何自新	11
我驾机起义前后/梁惠福	14
回忆“穷棒子社”/王国藩	19
韩复榘审案实录/乔新尘	29
记蒋介石的一次召见/韩立才	30
何键派人挖掘毛泽东祖坟经过/阳涛良	31
李公朴、闻一多被害案惩治真相/刘荷光	33
川岛芳子对艺人的迫害/李万春	35
川岛芳子伏法目击记/迪 中	37
追忆侦破炮轰天安门案件/李宝树	40
审判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目睹记/张钟秀	43
“文革”期间的李立三/李思慎	46

●人物春秋

陈毅谪居石家庄/张建华	49
毛泽东与续范亭/杨子 谢江	54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吴禄贞/郑一民 陈跃林	56
冯治安将军事略/张闻达	65
民族英雄马本斋事略/献 文	72
胡适与溥仪/杜春和	75
我所知道的商震将军/王兴纲	78
朱占魁沉浮录/李 锦	85
回忆载涛先生/郑新潮	92
李莲英轶事/崔跃魁	97
军阀孙殿英生平见闻录/李鸿庆 程一民	103
李立三之死/习 金	123
近代中国“四公子”/任凤霞 迟秀才	125

●政坛纵横

台湾“孙立人兵变”案内幕/李伶伶 王一心	128
汪精卫河内遇刺始末/赖敬业	137
我所知道的伪蒙疆自治政府/陈仲庸	144

●军史兵林

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刘莘园	147
傅作义困守涿州百日记/王畅 桂郁	157
马革裹尸——戴安澜将军殉国记/李 颖	167

目 录

EA36/44

●史海存真

西柏坡土改风云录/阎 涛	169
军统特务破译密码内幕/陈 达	176
“名将之花”日中将阿部规秀毙命黄土岭/省志办	179
绝域逢生的美军飞行员/史向荣	182
袁世凯葬母/李相宾	188
1947年“共党谋报案”/李敬尧 朱 赤	191
陈仪其人与台湾“二·二八”起义/汪天民	199
汪精卫墓被炸始末/王怀廉	202
张作霖祖籍探源/李玉川	203
末代皇妃离婚记/张景宝	205
张之江南京烧鸦片/郭瑞祥	209
回忆王若飞在绥远被捕前后的经过/王任之	210

●百年要案

共和国反腐败第一大案	
——刘青山、张子善案件始末/石玉新 孙如宾 武永召	211
南京刺汪案的最后判决/刘澄清	225

●经济史踪

李嘉诚事业发展的三次机缘/方式光	227
曹锟盗印东三省银行假钞之真相/孙树勳	231
武百祥的经商之道/杜士林	233
大漠商舟/于文龙	237

●文化天地

张伯苓与中国话剧第一出/张玉芳	241
晏阳初与平民教育/晏升东 孙怒潮	242
胡适之先生逸事一束/魏际昌	247
关东的烟文化/曹保明	253
体坛宿将穆成宽/王文生	255
旧北京的集邮活动/杨启明 沙伯泉 韦景贤 王席儒	263
评剧之父成兆才/时 光	267
一代名伶刘喜奎轶事/陶广仁	270
回忆我的父亲奚啸伯/奚延宏	273

●旧闻杂俎

奶奶庙与尼姑泪/马淑敏	278
旧北京的“三阀”/陶广仁	281
“八大胡同”妓院黑幕/阿 尚	284

我的童年

●侯宝林



▲侯宝林

我可能是天津人

大约在我4岁多的时候，我坐过火车。当时带我坐车的人，是我的舅舅，叫张全斌。我记得那时我的打扮挺滑稽的，穿着蓝布大褂、小坎肩，戴瓜皮小帽。那时候，小孩子扮成那个样子，够不错了。在我的童年中，也就只有过这么一次。在火车上，因为小，没坐过火车，也很少见过家里以外的人，觉得挺新鲜。也许人在幼年时代终归想要些光明温暖吧！那时舅舅抱着我，哄着我，我觉得很温暖。一路上吃了半斤炒栗子，睡了一会儿觉，就到了北京。根据这个情况，现在估计起来，我可能是从天津来的。我现在对我原来的父母还有个模糊不清的印象，父亲、母亲形象还能回忆起一点儿，但很模糊。究竟家里姓什么？哪里人？不知道。只知道自己

的生日和乳名。生日是自己长大以后听家里大人说的，是农历十月十五酉时生人。所以我的乳名叫“酉”，北京人习惯爱用儿化韵，前面加个“小”，后面加“儿”，就叫“小酉儿”。

我不知道我原来姓什么。到北京这一家来以后姓侯。我们家住在地安门里织染局路北一个门里，里院的一间东房。这时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其实，这不是他的本行。这个差事是舅舅帮他找的。因为舅舅给唱戏的当伙计，老年间的名词叫跟包。舅舅当时给朱琴心和程继先两个人跟包。程继先是有名的小生。中国近代最有名的小生像俞振飞、叶盛兰等人都拜他为师。舅舅从17岁起就给程继先跟包，一直到干不动回家，一辈子就是个跟包的，是个大家都信得过的跟包。他名字叫张全斌，可是一般人都称他“张二”。后来我听说是舅舅央求朱琴心介绍父亲到警官学校庶务课当课员的。这个时候家里吃饭还不成问题。我小的时候有两个外号：一个是我换牙时人家管我叫“豁牙子”；另一个外号“小麻子”。因为我出过天花，脸上的麻子不大，小时候明显，长到20多岁，就一点也看不出来了，但身上、手上的麻子比较大，所以后来我在天桥跟“云里飞”搭班儿唱戏的时候，有一个阶段人家管我叫“小麻子”。父亲在警官学校庶务课干了顶多一年就失业了，我们的生活就困难了。看来父亲当那个事务员，日子也不宽裕，因为他只住一间东房嘛！而且面积不大。我的童年时代没有什么玩具，不象现在小孩一讲起玩具来有多少种，我没见过玩具，我只玩过炮台烟铁筒里的烟碟儿。因为父亲在庶务课当课员，当官的招待完客人，剩下一些香烟筒没有用处，父亲就捡回几个小铁碟儿给我玩。给小铁碟凿三个眼，拴上三根线，把这三根线拴在筷子上，再捡个铁玩意儿当秤砣，这就是杆小秤。这就是我的最高级的玩具，也是我的唯一的玩具。我是挺喜欢这种小秤的。

父亲失业后，我已经5岁了，那时只能靠舅舅每月来两趟，送点钱敷衍着生活，实在生活不下去。后来还是舅舅又求朱琴心的朋友给父亲找的工作，去当厨子。就在现在定阜街北京师

范大学那个地方。原来叫辅仁大学。辅仁大学没有盖起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是载涛的房子,叫涛贝勒府,正赶上载涛聘女儿,是二女儿还是三女儿记不清了,反正用满族的名子,叫格格(不叫小姐),不是二格格就是三格格出嫁,厨房要添人。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到涛贝勒府当了厨子,这是他的本行,我的父亲是个厨师。我们不住在织染局了,我来到北京后住的第二个地方就离现在住的房子大约100米远,叫龙头井。现在的门牌是32号,是个路东的门儿。我们住在对着街门口的一间小东房里,比人家大房低一截。小东房旁边的南山墙就是厕所。可以想象我那时住的地方条件是多么差了。不久,我们又从龙头井这间小东屋搬到羊角灯胡同去住,是个路北的吞头门,院里有两棵大柳树,我们住两间小东房。这是我到侯家以来历史上唯一的一次住过两间东房的时候,尽管几个月,我们也算住过两间东房了。

其实,对北京人来说,东房和南房最不好。北京涛贝勒府办完喜事以后没几个月,父亲又失业了。我们就住不起这两间东房了,我和母亲又搬到东煤厂去住。东煤厂挨着大翔凤胡同西边一点儿。大翔凤原来叫大墙缝,是个很窄很窄的小胡同。我们就住在这条很窄很窄的胡同西边的一块高坡上,是个路北的门儿,我们住一间南房。我这时6岁了。父亲失业以后,还是靠舅舅每月来一两次,周济一点钱。舅舅在姥姥家排行第二。我还有个舅舅,大名字叫什么,记不得了。大舅在御膳房当厨子,人非常老实,是个好人。我的舅妈是蓝靛厂六郎庄人。那时候我们家因为穷,连东煤厂那一间南房也住不起,也搬到姥姥家去住了。大舅妈待我不错。记得有一次母亲陪着姥姥到东官房三姨姥姥家去串门,家里就剩我跟大舅妈两个人。大舅妈嘱咐我千万别跟人说,然后拿出一个小铜板来,从门口卖芸豆的那儿买了点芸豆给我吃,那时一小枚已经买不出什么东西来了。这件事虽小,但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记得在我的童年里好象就花过这么一次零钱。后来舅舅的生活也不好了,姥姥家也住不起这两间北房,就搬到护国寺藕芽胡同去住,门牌2号,房东姓石。我们住一进门的一间小西屋,这间房顶多有8平方米,很窄,我们不好意思再住在姥姥家了,就搬到现在柳荫街的地方去住,就是北京师范大学

学北墙外边的小胡同,那时叫扁担胡同,我们住胡同东口路北头一个门里。我们住在一进门的一间小南屋里。这时我们的境遇更困难了,父亲不知道到外埠去干什么事,慢慢地我们连这间小屋也住不起,没办法,就又回到姥姥家那间8平方米大的屋里去住。姥姥家本来就有大舅夫妻俩和姥姥自己,现在又加上我们娘儿俩,怎么住呢?只能每天搭铺睡,我就睡在一张小饭桌上。这日子可真难过。但是尽管日子不好过,我们家是旗人(满族),家里的规矩还很多,例如你要看看街上的景色,只能站在门里朝外看,不能出门坎。那时正赶上我们对面那户人家盖房,盖房打地基时要砸夯,砸夯时要唱夯歌。一个人站在高处喊,大家拿着夯等着。他唱一句,下一夯;唱两句,又下一夯;这叫夯歌。夯歌很好听。我在童年时代没看过戏,没听过音乐,就站在门里听人家唱这夯歌。我第一次接触艺术就是听这夯歌。也许因为我没有听过其他音乐节目吧!那简单的夯歌竟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为了生活——捡煤核去

我们在姥姥家住不下去了。我们这些口人,住在8平米大的房里实在太挤了。二舅看不下去,就给我和母亲租了一间房,搬到福寿里19号去住。福寿里原名叫中官房,因为这一带还有东官房、西官房(即五尾里),三座桥那边还有南官房、北官房,福寿里就叫中官房。所谓官房,据说是那拉氏当初省下脂粉钱委托太监或内务的人给她在外头盖的民房,假称是要解决所谓老百姓住房困难的问题,所以这叫官房。这当然是谎话,清朝政府哪能解决老百姓的住房问题呢?实际上这些房屋都是高价租给穷人的。我们住在福寿里19号,住一间北房。这可是我们第一次自己住北房。我还记得我从天津来北京的时候,我原来那个家住的是一间东房,到北京后搬了几次家住的都是东房、西房、南房,除了在姥姥家住过北房外,这次是我们自己住北房了。我还记得房东姓银,叫银进臣。母亲和我在北房住了一个时期,后来因为老欠银家房钱,就搬到南屋去住。再往后,我们又从福寿里19号搬了出来,大概搬到23号,还是银家的房子。那时涛贝勒府已经卖了,开始盖辅仁大学。我记不得那时是几岁,但我记得我开始帮着家里过日子了,北京话就叫捡煤核。

正好那时辅仁大学盖房，整筐整筐的碴土往外抬，福寿里中间即现在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地方正好是一个大坑，碴土就倒在坑里。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就整天在那些脏土碎砖堆里捡些钉子、铁皮，偶然捡到一些铜丝就高兴得不得了，要是捡到一个水龙头，那更是“发大财”了。就在这个时候，我又有了一种新的童年游戏，那就是弹球。弹玻璃球，那玩法虽然很脏，老蹲在地上玩，但是它的方法和道理却和今天打台球一样。我对它是有兴趣的。

这时家里的生活愈来愈困难，父亲在外边一直不回来，家里就靠舅舅每月接济一点钱。舅舅的情况看来多少也有点困难了。于是，到冬天，我就跟着街坊打粥去。那时北京有些慈善机关办粥厂，专门给穷人施粥。离我家最近的粥厂就在三不老胡同东头路北。打粥要天不亮就去，我身上又没穿多少衣服，站在那里一个一个挨着排队，冷得直哆嗦。因为施舍的粥只有两桶，每人给一勺，你去晚了就打不上了。所以尽管冷，也必须早早去排队。打来这一勺粥，拿回去掺点水，就凑合够我们娘儿俩一顿饭了。去打粥的人，小孩子多，大人少。为什么？那是因为大人爱面子，就让孩子去。要是大人去了，多打一份，多吃一点，不更好吗？可是大人不去。对我来说，我想还有个原因，恐怕因为不是亲妈的缘故。要是我有亲妈的话，我想她不会放心让孩子自己去打这一勺粥。我小时候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听话？多冷的天也愿意早早去排队。也许我没有亲妈，不知道什么叫温暖吧！所以尽管挨打受气，还要干活，任何怨言都没有，好象都是天经地义似的。只有当我和别的孩子凑在一起，不在妈妈跟前的时候，才觉得自己自由了一点，我才敢说几句俏皮话，逗个乐。当时我们穷得那样，冻得那样，饿得那样，比我大一些的孩子居然还想搞“创作”。看来中国人是有智慧的，从我们那时搞“创作”这一点来看，就可以得到证明。大概这属于口头文学吧！我记得我们编过这样一首童谣：

火车一拉笛儿，
粥厂就开门儿。
小孩给一点儿，
老太太给粥皮儿；
擦胭脂抹粉儿的，
给一盆儿。

为什么会有擦胭脂抹粉的大姑娘、小媳妇去打粥呢？因为德胜门关厢一带，离粥厂近的人家，家里都养猪。他们打粥回去是喂猪的。这些人家的大姑娘、小媳妇每天擦胭脂抹粉，到了粥厂和人家有说有笑，给施粥的人递个眼色，就打一盆粥。有人知道这个底细，所以这帮孩子们在打粥排队受冻的时候，就编出这样的童谣来讽刺她们。

卖冰核儿和卖报

冬天打粥，到了夏天，父亲就出主意：卖冰核（音胡）儿，也能挣几个钱嘛！卖冰核儿，也就是卖天然冰。没有工具。我就找了根棍，还捡了个人家使坏了扔掉不要的破搪瓷脸盆，在盆边打四个眼，用绳子拴起来，这就是放冰的工具。冰窖离我们家不远，就在过北海大桥往东再往北拐的那个地方。冰窖一共有3个大窖，秋天是大坑，冬天把什刹海里打上来的冰储存在那儿，就成了冰窖。

我那时用3个大铜板到冰窖去买一大块冰，请冰窖的人拿冰镩把冰破成两块，我挑一付担子，前边搁半块，后边搁半块。天气最热的时候，我就卖冰核儿去。我记得我卖冰核儿做过一次好生意。有一天，我从东边走进我现在住的这条胡同，就在我现在住的地方往北路西有个死胡同，我走到路北的那个门口一吆喝，里面出来一个人。大概那人家里正有病人，想给病人冰点什么东西，而且看来那人也是不常买东西的。他说：

“卖冰的！这两块冰多少钱？”

“20个子儿！”

20个子儿本来是要谎，你给10个子儿我也就卖了。不料那人说：

“好，搬进去吧！”

我就给人家搬了进去，人家给我10个大铜板。10大枚！3大枚的成本，赚了7大枚，赚两倍还多。我就做了这么一回好生意。第二天我再挑到这儿，吆喝半天，希望那人再出来，可再也没人出来了。

我卖冰核儿的时候，3大枚的成本，最少也能卖6大枚，赚一倍。天气热，生意就好，天气凉，生意就差；要是下雨天，就苦了我了，怎么办？我就跟街坊借了10个大铜板，顶着雨跑到兴华寺街（现在叫兴华胡同）西口往北路西的那

个粮店里，买了一斤多豌豆，回家后搁点盐 and 花椒煮了，不能煮太熟，煮九成熟，捞出来晾一会儿，皮一皱，叫“牛筋儿豌豆”，好吃着哪！我那时为了多赚钱，煮的工夫就大一点，好多出数，这样豌豆晾干后虽然皮不太皱，可是我吆喝时还喊“牛筋儿豌豆”。那天下着雨，我煮熟了豌豆，披着麻袋挎着个筐去卖豌豆了。麻袋做成蓑衣式样，连头带身子都护住。筐上面盖着条比较干净的毛巾，其实那毛巾挺脏，不过在我们家里来说，就算是最干净的了。下雨天卖豌豆是好买卖。因为天一下雨，一般卖小吃的都不出去，我是独一份儿，准能赚钱。10大枚本钱的豌

豆，我可以卖20大枚多，赚钱也在一倍以上。这样，回家来我还街坊10大枚的帐，剩下这10大枚多就买一斤玉米面儿蒸顿窝头，顶多再买一大枚的咸菜，我们娘儿俩就凑合吃一顿饭。明天，明天再说明天的吧！

后来，听人说卖报能挣钱，我就去当报童了。卖报，那时又叫“跑报的”，就是卖报的老得跑，你休想闲着。卖报有发报的地方。大报，象《世界日报》这样的大报，我们不敢卖。大报成本贵，利润低，卖大报赚不了几个钱。我们只能卖小报。北京又把小报叫“野鸡报”。那种报纸也许出三、两个月，也许出两期，就完蛋了。小报利润高，能养活我们这样的报童。小报单有个发报的地方，在西琉璃厂西口南柳巷一个破庙里。我为了卖小报，就得从福寿里走到南柳巷去取报，再跟着那些会卖报的去“赶新闻”。什么叫“赶新闻”？“赶新闻”就是要抓住当天报上吸引人的消息大肆宣传，让大家来买你的报。譬如说，西单皮库胡同、大木仓一带都有公寓。那时候大学生都住公寓，住公寓比住民房贵，比住旅馆便宜。今儿个要是皮库胡同某某公寓出了个什么新鲜案子，这就行了，今天的饭算有了。我取完报，撒腿就跑，跑到最前面去喊：

“看报啦！看报啦！今天什么什么公寓出了什么新闻啦！这事可了不得啦！上边还带相片啦！……”



▲侯宝林、郭启儒演出照。

只说这么几句，下面的内容就不告诉你了。卖报的规矩就是这样，不能把内容告诉人家。这样一嚷，大家出来围着你买报，今天的饭钱就有着落了。但是我卖小报没几天工夫，因为我不会“赶新闻”，卖报非得有新闻，哪儿出了凶杀案，哪儿出了乱子，报纸才卖得动。可我不认得字，除非有个认字的还爱说话的人告诉我，我才能“赶新闻”。那时人家大人卖报的不跟我们小孩一块走，人家会“赶新闻”，我不会。我卖了几次报就不卖了。我赚不了几个钱。我卖报的时间不长。

我终于要饭了

父亲见我甭管卖什么，总能赚回几个钱，帮助家里过日子，后来干脆托朋友打了个木头花篮，叫我去做小本生意。这种花篮是个长方盘儿，上边有个梁，可以挎着；底下有个座儿，可以搁在地上。我父亲到德胜门小市给我趸点糖果、花生米，叫我挎着篮儿去卖。我不会做小生意，这回连本都赔了，连工具钱也没赚回来。实在没办法，我只好去要饭了。

要饭，得厚着脸皮挨门挨户去喊：

“行好的老爷太太，您给点吃吧！”

这够寒碜的！我觉得难看，我只得到离家远一点的地方去要饭。我拿着筒，从龙头井南口的豁口（就是现在什刹海体育场）一直向南走，到旗坛寺、养蜂夹道、刘兰塑、北医附属医院后

墙一带去要饭。那边离家远，可以避开我认得的人。肚子实在饿极了的时候，要到什么东西，随手就拿来吃了。这可不象过去做小买卖那阵，我挣来的钱，一个钱也不敢花掉，也不敢说谎话，赚来的钱都老老实实地交给家里。

在要饭的年月里，有件事是我至今也忘不了的。那就是我走到羊房夹道那地方，是路东的一个胡同，在路北一个大门口，看见一个给人家看孩子的奶妈。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就管她叫大妈，我向她要吃的。

“吃的倒没有，我给你找身裤褂吧！”

她给了我一身裤褂，那是人家少爷穿旧的裤褂，洗得真干净，这是我要饭时要到的最好的东西。另外，有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给了我一双他穿不了的鞋。

我要饭的时间正是1929年初。那年月兵荒马乱，军阀混战，有时就在大街上抓人去当兵。北京驻的军队很多，旗坛寺就是驻兵的地方。旗坛寺是个庙，在清朝就没有了，但这个地名还保留到现在，就在现在西什库东巷一带，北洋政府的参谋部就设在那里。那天早晨，我在一户人家大门前影壁后面，发现有个纸包，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顺手拿起来掂了掂，就搁在筐内拿回来了。回家打开一看，是身灰色军衣。现在研究起来，那是有人开小差了。那时老打仗，部队要开拔去前线，有的兵开小差，扔下军衣走了。还有，我在什刹海乐家房子前头，也是影壁的后面，还捡过一套军衣。

要饭没有准谱，有时要得着，有时要不着。要来的东西也不会有新鲜的，都是人家剩下的、馊了的东西才给你。那些有馊味的东西，我们回去搁点碱，蒸一蒸，把馊味去掉，照样吃。正在我要饭的时候，父亲好不容易找到职业，又去当厨子了。父亲经过舅舅介绍，到了宛平县当警察（宛平县衙门在哪儿？就在东官房南口往东一点，现在全国妇联干校西边的那所房子里。那个时候，北京有个奇怪的现象，河北省很多县，象宛平县、香河县等，县衙门都设在北京城里。北洋军阀沿袭旧制，把明、清两代顺天府制改称“京兆”，府尹就叫“京兆尹”，原来顺天府管辖的24个州县，划出去4个县，其他20个县的县衙门都设在北京城内。）父亲当警察没多久，来了个县长，姓朱，大概是个南方人，他要找个厨子。他家就住在平安里口外靠东边的第一

所房子里。他听说警察里有人会做饭，就把父亲调到他家里，脱下警察衣服当了厨子。这时候，我还在沿街要饭，实在要不到东西，我就到和平里去找父亲。父亲是个厨子，总能想方设法给我弄点吃的。

我要饭的时间大约一年多。这一年內，只要有我干得了的活，我总想法去干，为家里挣几个钱。那时父亲在县长家做饭，他看到宛平县征来好些新兵，就告诉我去卖水。这些兵是从各处征来的，呆不了三两天就得开走，商店老板等为新兵送来了烙饼，为的是他们吃了好走。但是没有水。我就拿个大铁壶，再拿几个碗，去卖白糖水。白糖水卖一个大铜板一碗，够贵了，但是这些兵吃烙饼的时候没有水，非喝不行。这样的活也就干了三两天，新兵一开走，我就不卖水了。

有一天，我出去要饭，走到福寿里西边黄城根一带。那个地方有个庙叫嘉兴寺，那个时候常搞殡葬。我走到那里，被人叫住了：

“喂！那孩子，‘打执事’^①吗？”

“打执事”，这当然是好事，我又可以挣几个钱了。但是象大伞这样重的东西，我举不起，我可以打“雪柳”^②嘛：那是比较轻的东西。那回“打执事”，我从嘉兴寺走到阜成门外八里庄，挣10个大铜板。那人先给我5个大铜板，我买些东西吃，吃饱了好赶路嘛！等走到八里庄，把“雪柳”交还了，又给我5个大铜板，这叫“拿找儿”。“打执事”，我就干过那么一次，因为家里不让去，太远啦！我那阵子还小，真要走远了，恐怕回来时都找不着家了。

我还帮人拉过水车，那是下雨天。下雨天要饭没法要，下雨天我上哪儿去要饭呢？那时兴华寺街西口有个水井，一个山东人开了个“井窝子”^③，把水打上来，倒在大槽子里，然后雇个人推着水车，挨门挨户往各家送水。一到下雨天，道上坑坑洼洼的，车不好推，推水车的就找个小孩在前边帮着拉一把，给2个大铜板，拉两趟给4个大铜板。我那时个子小，力气也小，拉水车没多大劲。但推水车的人没斥责我，只是说：“使点劲，使点劲！”他只要我帮着他把水车拉过路上的水沟，把水平安地送到各家，然后帮着他把水车送到“井窝子”，就算完事了。有时送回水车，正赶上他们吃饭，那个推水车的大爷还偷偷地掰半拉窝头塞给我，这事还不能让开水

井掌柜的看见。那时候，穷人和穷人确实心连着心哪！这是一点也不假的。

那一年，我要饭过日子，有时还干点杂活，象上面说的拉水车等。生活实在没法子过。父亲是个好人，有一次他和母亲说：“这孩子就老跟咱们这么饿下去吗？咱们给他找个吃饭的地方吧！咱们别让他也跟着咱们饿死呀！”于是他就送我去学徒。先在崇文门外一家织带子的作坊里，织腿带。我在那儿学了几天，看见师兄打人，吓得我连饭也吃不下，人家就把我送回来了。父亲又把我送到颜泽甫老师那儿去学戏。颜老师原来就住在福寿里19号一间西房里，和

我们是街坊，后来搬到天桥去住了。他那时正跟“云里飞”（一个街头艺人）的场子搭班拉胡琴，他想找个学徒的，到我们家来过一趟。我们和他一说，他同意，父亲就把我送到天桥跟着颜老师学戏去了。

（原载总45期）

① 殡葬队伍中，打幡、打伞或举其他东西的人统称“打执事”。

② 竹竿上面裹着一些白纸条，象带雪的柳树，叫“雪柳”。

③ 卖水的店。

周恩来派我见囚禁中的叶挺

● 陆 诒

1943年5月，日军进攻我鄂西山区，并沿江推进，历时两周，旋即撤回宜昌。从这次鄂西战役的规模与战果而论，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国民党当局却吹嘘为重大胜利，纷纷祝捷。重庆全国慰劳总会于6月份奉命组织鄂西将士慰问团，由国民党元老张继和孔庾担任正、副团长，遍邀各团体和各报社参加。国民党的这类活动，历来不邀请中共《新华日报》记者参加，但这次他们竟然破例，向《新华日报》发出邀请，实在出乎意料。

我得到邀请立即回化龙桥《新华日报》编辑部向编委会汇报，并作初步研究。大家认为，这次鄂西战役的胜利是浮夸不实的，而慰问团长张继又是国民党内比较顽固的人物，如果应邀而去，势必自找麻烦。大家推我到曾家岩50号，去向周恩来同志请示，再作决定。



▲ 叶挺

周恩来同志接见了，我，先仔细地听取了我的汇报，并问我个人的看法。我说，曾经和大多数编委商量过，大家都主张不参加，免得自找麻烦。这时，我感到周恩来同志在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我，并针对着我的想法，提出了严肃的批评。他说：“要斗争嘛，就不能怕麻烦！我们不仅要敢于斗争，还要善于斗争，而且要善于把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这次国民党方面既然邀请我们去，就不能轻易放弃这种机会。当然，我们不能跟着他们去宣传虚夸的胜利，但到前线去慰问广大军民，尽可能把他们艰苦抗战的情况报道出来，这也是我们应尽的责任。这次，我就是要派你去参加慰问团，除了采访报道前线情况之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要你努力完成。”

接着，他告诉我：根据消息，叶挺将军和他

的家属最近已由重庆转押至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湖北恩施，由陈诚负责看管。你可以持我的亲笔介绍信去访问陈诚，向他直截了当提出要求，要单独访问叶挺将军，我估计他是难以拒绝的。武汉会战前后，你见过陈诚多次，熟识此人。我也记得你在1938年3月底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见过叶挺将军，他会认识你的。只要你沿途保持机警、沉着，你必能完成任务。至于信件、应注意事项和需要转达叶将军的话，临走时再告诉你。

接受这次批评，明确此行任务，我即于6月19日随全国慰劳总会鄂西将士慰问团出发。汽车先到綦江，然后沿川湘公路经酉阳、秀山、黔江、彭水等地，进入湖北省境。随团的国民党中央社、《中央日报》和《益世报》记者几乎都是职业特务，他们在沿途对我暗中监视，严防我展开活动。每晚夜宿，《益世报》记者总是与我同居一室，殷勤叙说，颇想从我口中探到一点讯息。我假装糊涂，他们玩的一些小动作，我早已看得一清二楚了。

慰问团在23日下午到达恩施。陈诚和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将军率领湖北省党政军各界代表在城外20里的公路大桥旁欢迎，仪式隆重。陈、孙两位和慰问团正、副团长及全体团员一一握手见面，孙连仲将军见到我时，显得特别兴奋。他紧握着我的手说：“台儿庄战场别后已有多久了，别来无恙乎？”这句话被《益世报》记者听到，他在晚上就问我：“原来你和孙将军很熟，不知同陈司令长官熟不熟？”我说：“武汉会战时也见过几次，但并不熟。”

第二天上午，当地举行劳军大会。中午，陈诚在湖北省政府大礼堂设宴欢迎慰问团全体人员。我被安排与省政府委员朱代杰同桌，他和周恩来同志也是相当熟的。席间，我只和他寒暄几句，等席散，当随团记者都去围着陈诚谈话之际，我就约朱到休息室一谈。我说此行携有周副部长（抗战初期，周曾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与陈诚共事）的亲笔信，要我面呈

陈辞公（陈诚字辞修），望转达此事，约好一个单独谈话的时间。朱代杰欣然同意。打通了单独访问陈诚的第一关，我就若无其事地跟随慰问团集体参观并看戏，消磨了整个下午。

25日上午8时，陈诚果然派他的副官坐小汽车到招待所接我去谈话。中央社和《益世报》记者目睹我登上汽车疾驰而去，深表诧异。陈诚在1943年上半年新任中国远征军总司令，常驻昆明，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与湖北省政府主席只是他的兼职。这次鄂西战役，是孙连仲将军所指挥的。鄂西捷报传来，他特地从云南赶回来接待慰问团。陈诚在他的私邸接见我时，全副戎装，精神振作，显得非常得意。我面交恩来同志的亲笔信。他看信时频频点头，并强作镇定姿态，不等我提出口头要求，就爽快地对我说：“周公信上讲的，很对。希夷兄（叶挺字希夷）全家现寓恩施西郊，你要去看望不成问题，我可以派人带你去。你回重庆时，望代为转告周公，希夷兄由我就近照顾，安全与生活都没有问题，请他宽心！”接着，他又谈了对当前战局看法，但绝口不谈政治问题。半小时后，我即起身告辞，他吩咐副官原车陪我去探望叶挺将军。

出恩施西郊1.5公里，我们即舍车步行。走乡村小路，几个转弯就到了村口，看到有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岗，戒备森严。在一家农舍前止步，副官就指给我看，这便是叶将军的寓所。叶将军听到门外有客来访，即出门迎接，突然见到了我，面呈兴奋之状。我看到他身穿皮茄克、灰色西裤，精神焕发，还是像当年在汉口初见时那样英俊、威武，深感欣慰。他一见我就说：“昨天从当地报上看到你们来此劳军的消息，没有想到你还到村里来看我。”

我们一道走进屋子，叶将军的8岁女儿迎面跑来，他急忙抓住她的小手，轻轻地告诉她：“这位陆叔叔刚从重庆来。”同时也为我介绍，她叫扬眉。她朝我点点头，笑了。叶将军又介绍夫人李秀文和我见面，一起坐下来谈天。她身

穿白绸短褂,黑色绸裤,和蔼可亲,端庄大方。

有陈诚的副官在座,我只能谈点来恩施的经过,并故意问叶将军有关鄂西战役的情况。他对此了解不多,只能谈点观感,接着谈了一些当地生活近况。这样尴尬地捱到10点半,叶挺将军突然提出邀我在此共进午餐,叶夫人又乘机补充说:“吃家常饭,谈家常,我们又不请外人。”我会意地接受了盛情邀请,陈诚的副官这时才不得不告辞而去。我约他下午2时来接我。

“耳报神”一走,我就开始同叶将军作实质性谈话,先遵照周恩来同志的嘱咐,把我随身带去的5月份《新华日报》合订本和最近出版的几期《群众》杂志送给他。他非常高兴地说:“那太好了!这两份精神食粮比什么礼物都珍贵。我在这里平时只能看当地报纸与过时很久的《大公报》。”

我又将周恩来同志命我转达的话畅快地说了出来:“党中央和毛主席非常关怀你的处境,又非常赞赏你具有高贵的气节。皖南事变后,毛主席即发表重要谈话,提出包括取消蒋介石的反动命令,惩办皖南事变的罪魁祸首,释放叶挺回军任职,交还新四军全部人枪,抚恤新四军伤亡将士家属和撤退华中剿共军等六项要求在内的十二条善后办法以来,中共代表团在历次国共谈判中,都把恢复你的自由问题作为一个重要议题提出来进行交涉。董必武和邓颖超同志为了迫使蒋介石接受12项条件,曾经冒着被反动派捕杀的危险,拒绝出席1941年3月1日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党中央切盼你保重身体,耐心等待。要深信党一定能够为你争得自由,把你营救出去的。”

他听了这一段话,非常激动地对我说:“我也深信我的自由问题决定于谈判结果。我相信有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必能取得胜利。这一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几年囚禁中也没有动摇过。请你回去向周恩来同志汇报,并经

周恩来同志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请他们释念!”

我们的话题从苏联红军已从东欧战场开始战略反攻谈起,谈到国内时事。叶挺将军非常关切地问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情况。我就把1939年8月过黄河,经中条山到晋东南、冀南、冀中和晋察冀几个抗日根据地亲自采访见闻,扼要的谈了谈。

在谈到第二次反共高潮和皖南事变时,叶将军深有感触地说:“我在新四军工作中体会到:遵循党中央的指示去做就能取得胜利,否则必遭失败。皖南事变是反动派蓄意策划的结果,但从我军内部来说,项英对党中央一再要他提高政治警惕的指示置若罔闻,也是铸成大错的主要原因。在全军危急时刻,我也没能及早率部坚决突围,这次惨痛的深刻教训,应当永远牢记不忘!”

我就说:“第二次反共高潮,也以苏北顽军韩德勤部被我打垮和新四军扩大成为七个师而收场。目前,两党谈判仍在断断续续地进行中。估计蒋介石如果一意孤行,其结果也不会比前两次反共高潮更好。”

我们利用午餐的时间,畅谈很久。叶将军对国民党顽固派坚持反共、反人民的反动立场,表示极大的义愤,同时对国内革命形势又满怀着胜利的信心。下午2时,陈诚的副官来催我回去,我即向叶挺将军夫妇道谢,依依惜别。叶将军牵着他的爱女扬眉热情地送我到村口。扬眉还对我说:“你回重庆时,代我问候周伯伯、邓阿姨!”我走了一段路回头看时,还遥见叶挺将军和他的爱女仍立在村口,向我挥手。

我持周恩来亲笔信,奉命去见陈诚、访叶挺,终于完成了使命。这件事一直萦回在我的脑际。如今,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已把这次光荣的使命扼要地记入《1898—1949年周恩来年谱》中了。

(原载总55期)

与白求恩大夫在一起的日子里

●何自新

1937年冬天的一个傍晚，解放军总部管理处派我到毛主席身边工作，负责照料主席的日常生活。1938年初春的一天，毛主席突然找我谈话，说有一个外国医生要来延安工作，打算让我去照料他的生活。当时我心里真没有底，外国人说的“洋话”，咱这没进过学堂门的穷孩子听得懂吗？工作干不好可咋交待！再说我也真舍不得离开主席……

毛主席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一双大手慈爱地抚摸着我的头，笑呵呵地说：“怕啥，小鬼，慢慢学嘛，工作会做好的。”

望着毛主席那信任的目光，我向主席行了个军礼，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当天，我匆匆收拾了一下，告别了主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第二天早饭过后，管理员带我去见那个外国医生。一路上我的心情既紧张又新奇，我真想像不出要见的外国医生是个什么样子。

▼白求恩大夫正在治疗救护伤员



在一间宽敞的窑洞里，我看到几个外国人正大声谈论着什么。翻译同志见我们到了，忙走到一个上了年纪的外国人面前耳语了几句，然后转过身来，给我们一一作了介绍。啊！原来这就是我要见的白求恩大夫，只见他快步向我们走来，一边和我们非常热情地握手，一边用生硬的中国话问我：“今年多大了？都做过什么工作？”并打着手势让我们坐下，

我仔细地打量着眼前的白求恩大夫，他高高的个子，一头灰白色的头发，一双有神的蓝眼睛，身穿一件黑色的毛绒大褂，足蹬一双长筒皮靴，活脱脱一派“绅士”风度，给人一种亲切、开朗、和蔼的感觉。短短几分钟的接触，我紧张拘束的心情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看他对我们那股亲热劲，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

当时的延安，由于敌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生活上遇到了严重的困难，战士们没有衣

穿，没有粮食吃，只好用土豆、野菜充饥。刚来延安的白求恩大夫，一时还吃不惯中国的饭菜，尽管炊事员千方百计想把饭菜做得可口一些，无奈“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幸好白求恩大夫自己带来了一些食品，可带来的东西终归吃一点少一点，同志们都看在眼里急在心上。

一天中午，我刚为白求恩大夫煮好咖啡，他突然一头闯进来，拉着我的手就往外走，看样子很着急。他一直把我拉到一位正在河边洗土豆的老大娘跟前，弯腰从地上捡起几个土豆，高兴地嚷着：“这！好吃！好吃！”一边说一边还往嘴里比划着。我这才恍然大悟。这可万万使不得，领导上有过交代，我们自己再困难，也要保证白求恩大夫的生活。说啥也不能

让他吃这个。于是我使劲摇摇头，意思是不同意他的想法，白求恩大夫一看急得大喊大叫起来。为了不让他生气，我只好向老大娘要了一些带了回来。

到了做晚饭的时候，白求恩大夫亲自动手，把土豆洗得干干净净，然后放在锅里煮起来。不一会儿土豆熟了，他拿出几个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当着我的面，还故意装出吃得很香甜的样子。望着白大夫那一天天消瘦的面容，我难过极了，强忍着泪水走出屋去。

过了不久，白求恩大夫就要离开延安，到晋察冀军区工作了，组织上给他派来个身强力壮的大个子警卫员，白大夫一看连连摇头：“不要，大个子不要。”为了尊重他的意见，不一会儿管理员又领来俩儿小个子警卫员。白大夫看到他们都背着手枪，没等介绍便说：“不要带枪的，我只要这个小鬼就行了。”说着拽住我的胳膊上了汽车。

在汽车上我悄声问翻译，为什么白求恩大夫不要带枪的警卫员。翻译说，白大夫一再强调，带一个战士就减少一个战斗力，让这些战士上前线打鬼子多好！一个外国人为了我们的解放事业，想得多么周到，多么细致呀。

一路上，我们翻山越岭，昼夜兼程。汽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晃来晃去，把人颠得头昏目眩，可白求恩大夫没叫一声苦，没喊一句累，只是一个劲地埋怨汽车跑得太慢，恨不得一下子飞到前线才好。到达绥德后，因汽车不能通行，又改乘骑马。我清楚地记得白求恩大夫骑的是一匹黄色的高头大马，每次出发他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经过数日的急行军，我们在黄河边上的神木县贺家川医院停下来。白求恩大夫顾不上休息，就催促医院领导带他去病房看望伤病员。从中午他一直忙到满天星斗，才吃了点饭准备休息。刚刚躺下不久，白求恩大夫让我把他的行李搬到屋里来，只见他把衣服一件件全都拿出来，又一件件仔细地包好。我心里很纳闷，真不知道白大夫包这么多的衣服干什么。

第二天一大早，白大夫让我背着他包好的衣服，跟他到医院去。一到手术室，他立刻紧张地工作起来。每做完一个手术，白大夫都要亲手给伤员穿上一件自己带来的衣服，上肢负伤的就送条裤子，下肢负伤的就送件褂子。医院



▲何自新老人近影

的领导一个劲地劝他：“白大夫，不要送了，都送完了您还穿什么。”他却笑着回答：“我这是来中国第一次给八路军伤员做手术，送件衣服留做纪念吧！”不少伤病员抚摸着白大夫亲手为自己穿的衣服，拉住白大夫的手，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几天后，我们准备渡过黄河继续前进。部队领导为了确保白求恩大夫的安全，特地给他准备了一条大船，可他不放心装在其他船上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执意和同志们挤在装有药品的船上。那一天，风大浪急，小船在风浪中忽上忽下，左右摇摆。白求恩大夫不顾自己的安全，一个劲地招呼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药品和器械。”我们紧紧簇拥着他，唯恐他有个闪失，直到顺利到达河岸，大家才放下心来。

1938年6月17日下午，我们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五台县金刚库村。白求恩大夫受到了聂荣臻司令员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大家一个个精疲力竭，都想好好休息一下，可白求恩大夫没等屁股坐热板凳，就急着要到离驻地30公里的后方医院去。眼看太阳就要下山了，在大家的再三劝阻下，他才勉强同意住下来。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大家就被一阵马蹄声惊醒。原来白求恩大夫已牵出马来准备出发了。不一会儿，聂荣臻也披着衣服来到院子里，司令员亲自上前相劝，要他等天亮吃过饭再走。可白求恩大夫一句也听不进去，急呼呼地说：“一分钟也不等了，马上出发。”说着，翻身上马，率队向后方医院奔去。白大夫就是这样珍惜时间！他常说，务必珍惜每一分钟，多耽误一分钟，死神就会夺走一个伤员的生命。

白求恩大夫是著名的外科医生，但他从不

摆一点架子，更不搞半点特殊。他喜欢同战士们一样穿布衣、啃土豆。来到前线才短短的几个月，夜以继日的紧张工作，使他比以前更加消瘦、憔悴。聂荣臻司令员曾几次出面要他注意身体，毛主席也拍来电报指示军区每月要发给他100元生活津贴，以提高白求恩大夫的生活水平。他听到这一消息后，心情非常激动，在给毛主席回电时他说：“我谢绝每月百元的津贴，我自己不需要钱。因为衣食一切均已供给。”在前线，白求恩从未感到过生活艰苦，他觉得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战斗在一起，就是自己的最大幸福与快乐。

白求恩大夫的心里时时刻刻装着伤病员，而唯独没有他自己。有一次，部队首长送给他两只母鸡。炊事员高兴的不得了，把鸡炖得喷香，给白求恩大夫送了去。大概是炖鸡的香味太诱人了吧，多日未吃到鸡的白大夫，放下手中的书，端起鸡汤放在鼻子边，好久没有放下。望着白求恩大夫那副神态，我和炊事员悄悄溜出屋去，心想让他一个人美美地吃一顿吧。刚刚把门关上，就听到白大夫喊：“小鬼，别走，快来！”话音刚落，白大夫端着满满一小锅鸡汤，让我随他一起，向后院的病房走去。白求恩大夫把一勺勺鸡汤喂到伤员的嘴里，有的伤员得知这是首长照顾白大夫的，说啥也不肯吃。他就趁伤员说话的当儿，把汤送到伤员嘴里。一锅鸡汤喝完了，白求恩大夫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当我端着空锅，走出病房的时候，忍不住埋怨道：“白大夫，这是首长照顾您的，您却一口都没吃上。”他笑着用手刮了一下我的鼻子说：“你知道啥，伤员比我更需要。”

白求恩大夫不仅关心爱护我们的每一位战士，对边区的老百姓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把给群众看病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不管白天黑夜，风天雨日，只要有群众求诊，他从不推辞。一天，他外出巡诊，突然发现一个正在玩耍的小女孩是个豁子嘴，强烈的责任心使他不由地停下了脚步。他仔细端详着小女孩那秀气的脸庞，轻声对身边的翻译说：“一个女孩是豁嘴，长大了该有多么难看。”白求恩大夫叮嘱身边的工作人员设法告诉女孩的家长，他要抽空给小女孩做整容手术。时隔不久，他给小女孩做了手术。手术成功极了，女孩一家人笑了，白大

夫也高兴地笑了。他考虑到当地群众的生活很困难，为了给女孩增加营养，就把分配给自己的鸡蛋、炼乳送给了小女孩。女孩一家人说啥也不肯要，直看到白求恩大夫要真的生气了，方才收下。

1939年10月，白求恩大夫在一次手术中，不慎划破手指感染中毒。几天后病情急剧恶化，同志们都劝他休息，抓紧时间治疗，可他仍念念不忘自己的工作。他手中的手术刀在不住地颤抖，实在坚持不住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手术台。白求恩大夫双目微闭，呼吸急促，体温居高不下。他吃力地摇着头，对守护在床边的医生们说：“你们走吧，前方需要你们。”为了让白大夫能安静地休息，医生们含着热泪一步一回头的走出屋门，可大家的心又怎么能放得下呀！于是大家又轻手轻脚地回到白大夫的身旁。昏迷中他非常固执地挥着手，要医生们赶快离开。

军区首长得知白求恩大夫病危的消息，当即指示：“动员一切力量抢救。”然而，已经晚了，死神已向他伸出了罪恶的双手。白求恩大夫也似乎预料到了什么，挣扎着支撑起身体，打着手势让我把一个硬皮本和一叠纸放在他的胸前。他一笔一划艰难地写着最后的一封信。他写一阵，停一会儿，然后靠在被子上喘息一阵……白求恩大夫写给党中央的这封信，就是这样靠着坚强的毅力写成的。

11月11日深夜，秋风萧瑟，万籁俱寂。在昏暗的油灯下，我守护着白求恩大夫。望着他那双颊消瘦的面容和那深深陷下去的眼睛，我的心象刀搅一样难受。突然，白求恩大夫睁开眼睛，翻身用手抓住床沿，看样子想要站起来，我忙上前将他搀住。借着微弱昏黄的灯光，他看到了我哭红的双眼，一边喘息着，一边用生硬的中国话安慰我：“小鬼，你出去休息一会儿吧，我觉得好一些了。”多好的大夫呀，自己病成这个样子，心里还惦记着别人。我再也忍不住了，紧紧拉着白求恩大夫的手，失声痛哭起来。我万万没有想到，就在当天夜里五更时分，白求恩大夫安详地闭上了双眼，永远地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为之奋斗的伟大事业。（蔡峰峰整理）

（原载总48期）